



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

士商互动与明清社会转型研究： 以文学生态的主题叙事为视角

SHISHANG HUDONG YU MINGQING SHEHUI ZHUANXING YANJIU
YI WENXUE SHENGTAI DE ZHUTI XUSHI WEI SHIJIAO

■ 黄敦兵 著



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

士商互动与明清社会转型研究： 以文学生态的主题叙事为视角

SHISHANG HUDONG YU MINGQING SHEHUI ZHUANXING YANJIU
YI WENXUE SHENGTAI DE ZHUTI XUSHI WEI SHIJIAO

■ 黄敦兵 著

作者简介

黄敦兵（1975-），中国哲学博士，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后，校学术骨干，教研室主任。出版了《黄宗羲伦理思想的主题及其展开》《贾儒之间：明清之际文学生态中的士商关系类型研究》，校释了《潜书》《孔子家语》《子不语》《列子》《出土简帛道家文献辑校》，发表了论文50余篇。主持完成了教育部、省社科、教育厅等课题7项。目前承担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子课题、教育厅重点课题、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校级教研课题各1项。

总 序

1919年，当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正在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进行了一次题为《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在百年的曲折前行中，韦伯的演讲像暗夜中的一盏明灯，给无数中国学者带来希望之光，影响深远。

面对当下社会转型、信仰缺失等矛盾与冲突，每一位有志于学术的学者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我们为什么要从事学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有人会悲悼目前的真空，在理念的世界中继续追寻一种专制。但是另外一些人，一旦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现了一种新的音调，一种新的观看的方式，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我相信这些人决不会哀叹这个世界是一个谬误，不会哀叹历史上充满了无足轻重的人，不会喝令别人住嘴以使自己的责难之声被人听见。”福柯的一番话解答了无数学者心中的困惑，指出了学术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游离于世俗价值之外的信仰，一种在繁华落尽之后仍能找到生命意义与希望的精神自足与崇高。

以学术为志业，要将生命融入学术，淡泊名利。国学大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清代学者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俗既俭朴，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竞，而终其身于学。”一个人只有超越名利的束缚，才能洞察宇宙人生的奥妙。韦伯曾言“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但若每一位有志于学术的人具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心理准备与承受孤独的勇气，同时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坚持，那么他一定会体验到“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与满足。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更是将生命与学问相联系。事实上，如果学术不能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不能融入生命意义与人生价值的话，要么变得空洞无物，要么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

以学术为志业，要怀经世济民之心，心系天下。很多人感慨：今天的社会很难再产生大师！是我们的物质条件太差？还是自身对学术失去了敬畏之

心？或许，我们可以从追溯往哲先贤的足迹中寻找答案。中国古代士人素有关怀天下的传统，宋代理学家张载将学术的追求归纳为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胸襟！在民国那个曾经大师辈出的年代，鲁迅、闻一多……一个个响亮的名字背后，是浓浓的战火，弥漫的硝烟。正是将思想与学问着眼于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生死存亡，大师们才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心系国家，才会以神圣而虔诚的态度面对学术，才会产生经世济民的不朽著作。反之，一心只为“稻粱谋”，纵然有万般才智，也很难成气候。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学术永远是大学的灵魂。作为一所合并成立仅十余年的年轻高校，湖北经济学院可能刚刚入门，谈不上鲜明的学术传统，但我们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建校至今，我们始终保持着向上的活力与动力。一大批以学术为志的年轻博士、中青年学者踊跃加盟，推动学校科研实力持续提升，高水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一套丛书不仅可以展现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还能展现一所学校、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时代的学术与思想风貌。正如我们观《永乐大典》，可以感受明代盛世的威仪与气魄；览《四库全书》，可以了解清代学术的整体格局。我们希望通过“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向社会展示学校的学术风貌与氛围。因此，我们遴选著作时，首先坚持精品原则，努力推出高水准的学术著作，宁缺毋滥。其次，我们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鼓励不同学科、不同学术风格的著作登上舞台。最后，我们希望一部著作不仅表达作者的学术观点，还能体现各自的学养与治学态度。严谨务实，充满个性的文章除了会给读者学术上的启迪之外，还能让人洞察到文章背后鲜活的人格与个性魅力。

学术文库建设没有终点，每一位以学术为志业的经院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行列。薪火相传，愿“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以此作为我们新的舞台和新的学术起点，伴随着湖北经济学院的成长与腾飞，愈加绚丽多姿！

湖北经济学院

目 录

导 论	1
一、问题意识	1
二、研究现状	2
三、议题与思路	6
四、研究方法	7
第一章 明清之际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变	10
第一节 商品经济的繁荣	10
一、城镇规模的扩大	11
二、城镇工商业的繁荣	13
第二节 商人阶层的再次崛起	16
一、中国传统社会国家的商业政策	16
二、明清社会商业商人阶层的再次壮大	20
第二章 明清之际文艺创作的商品化	25
第一节 世人精神文化生活的趋俗	25
一、物质欲望的膨胀与审美趋向的趋俗	26
二、“砚田糊口”：文人创作的市场自觉	36
第二节 通俗文学创作的文人化与文学题材的商人化	50
一、文人编撰、刊刻小说戏曲	50
二、文学题材的商人化	63
第三章 “商为本业”：商人精神的近世表达	70
第一节 “富贵不必诗书，而蓄资可致”：成功商贾的符号化意义	71
一、“以富贵相高，而左旧族”	71

二、“率以货为差”：从座次上反映的尊卑观	74
三、“货殖非小道也”：明清文学主人公“商才”意识的觉醒	76
第二节 “经商也是善业，不是贱流”：商人身份意识的觉醒	81
一、“睦婣任恤”：小而造福家族乡梓	82
二、“通功易事”：中而四民互利	83
三、“工商皆本”：大而利国富民	85
第四章 “衣冠道尽”：士格的跌落	88
第一节 “以货殖为急”：士类堕入市井之习俗而不自振拔	88
一、“士大夫之无耻”：晚明以降士节的低靡	88
二、“学校化为市井”	92
第二节 “衣冠多盗贼”：士阶层下品之流与民争利	97
一、“纱帽钱财”：视科举仕途为牟利肥家之径	97
二、“贪财无行，诡诈百端”：居官居乡士大夫多方牟利	105
第五章 互斥：前近代士商关系的典型	111
第一节 “贾竖之事”“下流之人”：士人鄙弃商人	111
一、指斥商人的无耻	111
二、斥责商人的粗俗	116
第二节 商人歧视士人	124
一、“满脸饿文”的挣扎者	125
二、科举场屋的暴发者	128
第六章 互许：近代士商关系的转型	136
第一节 士人“以清望为重”的道德救治	136
一、“文以载道”的风教关切	136
二、澄汰吏治士风	147
第二节 商人的“慕义强仁”	148
一、赈灾救难：经济扶助	148
二、“富而教不可缓”：兴盛文教	149
三、化民成俗：推进民间政治活动	154

第七章 士商互动与社会转型·····	160
第一节 “士与商常相混”：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新型士商关系 ·····	160
一、日常凡俗生活中的士人·····	161
二、文化市场上的“笔耕”者·····	165
第二节 “四民异业而同道”：新“四民”观与儒学转型 ·····	168
一、“儒”的扩大与众“民”归“商” ·····	169
二、从道德负担到“商业精神” ·····	177
第三节 从文学生态捕捉观念变迁·····	184
一、重申文学生态的主题叙事·····	185
二、如何从文学生态触摸社会的脉搏·····	185
主要参考文献·····	187
后 记·····	198

导 论

一、问题意识

作为一个值得反复涵泳的“长时段”，明代嘉靖初年至清代道光二十年近三百年的明清之际，被称为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在这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东西融通、古今交会的“十字打开”的宏大局面。其中蕴蓄的明清早期启蒙学术，构成“中国式的现代价值理想的内在历史根芽”，成为“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① 在对于这一时段的研究中，史学界多将晚明视为中国历史上关键的社会转型期^②，或专论晚明史^③，或关注商品经济发展与城镇化^④，都不同程度地批评了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商传就将晚明看成是“在旧体制的衰败中不断产生新生事物的社会转型期”^⑤，他认为明朝危机在于“国家权力异化”，在于传统政治体制未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清初的较大过错，是也未能对之进行纠错，像黄仁宇就将 17 世纪满清入主中原看作是“中国的倒退”^⑥。这一时段中的生活百态，可以透过思想史、文学史、经济史、政治史等进行追寻、触摸与品咂。

① 萧蓬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 页。

②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牛建强：（1）《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2）《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7 年版；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③ 樊树志：（1）《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2）《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 1991 年初版，中华书局于 2009 年修订版。

⑤ 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7 页。

⑥ 黄仁宇著，阿风、许文继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427 页。

与明清鼎革之际所张扬的士人气节之超拔相比，明清文学生态中的士人形象却呈现日益世俗化的特征。令人不无关切的问题是，作为传统的“知识人”，士人在传统“四民社会”结构中的优位感，为何会在此际逐渐淡出，从而大大消退了“精神贵族”“绅士风度”的昔日辉煌？传统社会中发生了怎样的“身份焦虑”？传统知识人（士人）和商人（尤其是“由商转士”的商人）如何消弭他们遭遇到的“身份焦虑”？士人在知识、德性、生存与信仰之间，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文学生态中是如何呈现士人生存的困厄、形象的世俗化的？文学生态中如何传达了传统“四民”的“身份焦虑”？这些现象，能否从明清社会转型这一视域进行某种程度的诠释？

众所周知，明清小说的研究著述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毫不为过，研究专家也代不乏人、灿若星河。在积累颇为丰厚的研究成果面前，专题研究似可视为初学者带有小技巧的偷懒取径。

本书将文学作品、作家及其相关的文化生态，均纳入“文学生态”的探讨中。基于学术兴趣与学术素养，笔者尝试着从小说叙事中提炼出“士商互动”这样一个重要主题，并审视这一主题在明清之际文学生态中的展开情况，企图从中绾绎出某些与思想史相一致的重要结论。

下面，分别检视一下本专题的研究现状、论题界定，给出相应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作为绪言。

二、研究现状

明清学术研究是当前的重要显学之一。明中叶以降至清中叶前的明清之际近三百年间，被称为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1905年，韦伯（M. Weber）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命题。斯宾格勒于1918年的著述中认为儒家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开始盛行“企业文化”热，“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使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韦伯式问题”引起热议，明清之际商业文化与文学及社会转型的关系也不断进入研究者视野。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等著述，旨在追溯“中国宗教伦理的俗世化”对“商人精神”的可能影响^①，即从“韦伯式问题”出发，“通过韦伯的某些相

^①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关的观点来清理中国近世宗教转向和商人阶层兴起之间的历史关联与脉络”^①，研究“明清商人的主观世界，包括他们的阶级自觉和价值意识，特别是儒家的伦理和教养对他们的商业活动的影响”^②。

当前国内外有关明清社会转型视阈中文学生态方面的研究成果，可概括为：

其一，在明清之际社会转型研究范式变化的研究方面：梁启超、钱穆之后，渐蔚成“文艺复兴说”“冲击—反应说”“早期启蒙说”“历史接合点说”“内在理路说”“曙光说”等诸多范式，而以近年来融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解释为一体的综合研究进路为深入之新途（冯契，1983；萧蓬父、许苏民，1995；葛荣晋，1994；吴根友，2004）。“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被为“现代现象”三大“题域”之一（刘小枫，1998），中国古代有着“超越的源头与挂搭”的“高度世俗化”的价值系统获得重视（高瑞泉，1999）。或从李贽到戴震的“近代”（岛田虔次）或“前近代”（沟口雄三）的“挫折”“曲折与展开”的思想史演变中探究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的历史源流；或提出明代学术发展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狄百瑞）。

其二，在明清之际士商关系新变及其文学呈现方面：

1. 在新士商关系界定上，产生了“士商互动”（余英时^③，2004；方盛良，2007）、“士商合流”（唐力行^④，2003）、“士商互渗”（吴仁安^⑤等）、“士商交往”（徐林^⑥，2006）、“士商契合”（陈书录^⑦，2007）、“士商交融”

① 余英时：《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② 余英时：《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③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唐力行：《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⑤ 吴仁安：《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

⑥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⑦ 陈书录：《儒商及文化与文学》六《士商契合中转向俚俗与性灵》，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2页。

(刘凤云, 2005)、“士商互识”(谢景芳^①, 1993)、“士商相混”(陈宝良^②, 2004)诸说。

自有归有光“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士与农商常相混”被发现以来，明清之际士商互动也被解读为“士商相混”。余英时曾有“士商混而难分”之说，用来指称士人经商、商人承担社会义务的情况。谭廷斌将明中叶以后士商之间的渗透、融合称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并分析其五大社会历史原因：商业利润把读书人诱向商贾之道；仕途的艰难把读书人逼向商贾之道；对独立人格的追求鼓舞了读书人行商贾之道；商人为努力提高社会地位，也热衷于学习儒家学说，致力于加入士人行列；儒家教义有助于经商活动；以及三方面社会影响，极大地提高了明清商人的素质；加速了商人集团的儒化过程；促进了明清之际异端思想的蓬勃兴起，改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③徐林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不仅刊发了大量论文^④，还出版了名为《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的专著^⑤，揭示中晚明江南士人“奔竞成风”、游走天下的文化现象，认为这些士人的社会交往大为拓展，逐渐加强了与商人、妓女、手艺人等市井之人的社会交往，从而呈现出“下移的趋势”。徐林的“士商交往”说，主要涵盖士人经商、商人习儒、商攀结士等“士商相混”的情形。

2. 在“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领域，邵毅平将士与商的关系分为“士人上位”“商人上位”“士商对流”三种情况以“士商关系”为主线，邵先生将商贾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分成七个方面，疏释了“士商互济”“士商对流”“士商缔姻”“商人、女人和士人”等概念。^⑥方志远、黄瑞卿认为，弃儒从商可以分为四种情况：(1) 家贫无力业儒，自己或甘愿身历艰危经商赚钱赡养义务，或受父母之命被改儒业贾；(2) 业儒不售，在金钱利欲的刺激

① 谢景芳：《明人士、商互识论》，《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

② 陈宝良：《明代的致富论——兼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③ 谭廷斌：《明清“士商相混”现象探析》，《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④ 徐林：(1)《明中后期士商社会交往评析》，《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2)《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2期；(3)《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贫士的社会交往生活》，《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4)《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⑤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⑥ 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下弃而经商；(3) 继承祖、父故业；(4) 绝意仕进，罢学就贾。^① 方先生还从“市民文学”研究城市文化。^② 另外，邱绍雄从“商贾小说”^③、葛永海从城市化^④视角切入古代小说研究，解析城市文化及士商阶层交往互动的文学生态。

其三，在士商互动的途径及社会转型问题方面：

1. 研究视角上，或从思想史连续性研究角度追溯“中国宗教伦理的俗世化”对“商人精神”的可能影响（余英时），或从明代致富论上探寻传统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的某些信息（陈宝良^⑤）；或从个案探论“韦伯式问题”，发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商人精神的嬗变（马敏^⑥）。

2. 研究进路上，或关注士商交往之原因，归于商人寻求心理平衡与文士心灵相通（朱万曙^⑦，2008）；或归因于士人世俗化倾向（黄果泉，2004；徐林，2006）。或关注士商交往之形式与后果，看到士大夫风雅趣味及时尚标准的变化^⑧，或看到造成“商业型文人与文化型商人”^⑨“集文士与商贾于一身”^⑩的新人格，或看到科举与商业的良性互动造成绅士风度的“绅商阶层”^⑪，或看到文学创作领域的新变及“通俗化浪潮”对“传统文艺的价值观念”的冲击^⑫。

① 方志远、黄瑞卿：《再论明代中后期的弃学经商之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② 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 陈宝良：《明代的致富论——兼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⑥ 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 朱万曙：《明清徽商的壮大与文学的变化》，《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

⑧ [加]卜正民著，方骏等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⑨ 傅承洲：《明清文人话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⑩ 黄果泉：《李渔：集文士与商贾于一身——试论李渔戏曲创作思想的商业化倾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⑪ 唐力行：(1)《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版；(2)《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⑫ 夏咸淳：《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的关系》，《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第61页。

上述研究成果，较之以往轻忽明清商贾文学的社会转型意义方面，无论在论域拓展还是在论题深化上，都已取得较大成绩，但仍有三个明显不足亟待改变：

第一，在明清文学生态中的士商互动主题的诸面相的分析方面，偏重“文学如何表现商人的问题”而“商人如何影响文学的问题”暂付阙如（邵毅平^①、邱绍雄），尚缺乏对相关题材“主题叙事”的“类型”深化及社会转型意义的提升。

第二，在思想史研究中，或强调经济社会力量影响（萧蓬父、许苏民、傅衣凌、岸本美绪），或突出思想史的内在连续性（余英时）或其断裂性（姜广辉，1997），或突出商人精神（马敏、唐力行），或以政治因素为主导（杨念群，2010），对文学史料的挖掘力度尚显不足。

第三，限于研究内容、方法及视域，未能充分观照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融通，明清社会转型特征尚须进一步彰显，文学生态对“四民社会”中主体地位更移、思想异动等方面的观照尚待拓展深入。

三、议题与思路

基于前述，笔者拟将学界已有的“文学与社会”的交融^②作为主要视角，以士商关系的文学主题叙事为着眼点，运用文史互证等方法，考察明清之际“士商互动”的文学生态现象，以追寻明清之际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叙事方法、模式与途径等。

笔者认为，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全面的社会“异动”，其中就包括“士商互动”这样在社会变迁中的值得关注的现象。在这场“士商互动”的大潮中，先秦社会以来形成的德位一致思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在经受了中晚明阳明心学的时代熏染之后，文人们在为市民写心之时，兼以己心为心，表达了个人独特的文学理念、生活观念与社会价值标准。在文学作品的作者所营造的“文学生态”中，鲜明地突出了新型而繁杂的“士商互动”的“文化现场”。文人学士开始站出来赞扬市井细民的美德，开始褒扬商人的良质，为商人“写心”了。由于知识阶层的扩大，部分商贾也加入到

^① 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② 比如杨国明所著《晚清小说与社会经济转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即采用此一视角，创获较多。

文学创作队伍。在诸多原因的推动促成下，文学生态中的商人形象开始大放光彩，商人也拥有了新的“树碑立传”的模式，几乎步入社会上流，成为主流价值观的评价主体之一。

四、研究方法

考虑到中国传统“四民社会”长期存在的实际情况，笔者在分析“士”与“商”之间的身份转换时，主要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而是暂时部分地采用社会学中社会流动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进过程中，“士”与“商”两种社会身份的相互流动、联接、分层、互识的复杂性。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會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原则，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层面的宏观叙事是主要方法。

如果再由此出发细分，又可概括为三种最基本的方法：一是文史互证方法，二是理想型方法，三是母题化方法。

第一，所谓“诗文证史”或“文史互证”，本是古典学术中常见的路数。本书所用之“文史互证”方法，即是参互运用思想史与文学史资料，突出“商”与“士”之间在明清之际这个较长时段中的“互动”情景，寻绎其中可能的原因及时代的意义。郑振铎先生说：“在官书，在正史里得不到的材料，看不见的社会现状，我们却常常可于文学的著作，像诗、曲、小说、戏剧里得到或看到。在诗、曲、小说、戏剧里所表现的社会情态，只有比正史、官书以及“正统派”的记录书更为正确、真切，而且活跃。在小说、戏剧，以及诗、曲里所表现的，不一定是枯燥的数字，不一定是无聊的事实账本，——要在那里去寻找什么数字，十分之十是要失望的——而是整个的社会，活泼跳动的人间。”因此，郑先生认为，研究唐代的史料，“存在于《太平广记》和《全唐诗》里的，准保要比新、旧《唐书》多而重要”，研究元代的状况，“元杂剧和元散曲却是第一等的最活跃的材料渊藪”。^①基于以上方法及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文学是社会心灵的直接表达，文学作品也是研究社会的重要史料。

第二，关于理想型方法，即“通过想象力把历史上的事象及其相互关系

^① 郑振铎：《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原载《文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4期。

联结为—整体……它本身不是历史的本相，但为历史本相提供了一种清楚的表现方式；它本身也不是一种假设，但其目的则在引导出假设的建立。我们必须先建构‘理想型’，以与实际的历史经验相比较，然后才能看出一组历史事象中的某些构成部分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理想型’的建构一方面是以特殊的历史经验为对象，另一方面又以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为核心”^①。余英时还说：“由于‘理想型’中的普遍性永远离不开特殊的历史经验，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便不得不根据特殊的经验对象而不断地创造新的‘理想型’；同时，一切已建构的‘理想型’也不能不随着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而不断地受到修正。”^②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搜集、整合、归纳出明清小说中士商互动的几种类型，然后再在明清小说中寻取更多类似的典型，以证明、修正、完善这种设想。

第三，关于母题化方法，即关注研讨“主题”的方法，笔者曾使用于此类说法^③。现代叙事学认为，“主题”其实即是作者对于“客观情景与现象的一种个人阐述与发挥，是‘母题’的个人化”^④。人物、情节和主题是小说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通过母题的个人化呈现，可以更好地绎出文学作品中的主题，由此纲举目张，较好地突出文学生态。笔者运用母题化方法时，侧重于寻求同一主题在不同历史文化场景尤其是文学生态圈中的不同表现，突出其在明清之际文学家笔下试图表达的时代特质，显示其在这一转型期所具有的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因子，以彰显笔者本文试图表达的“理想型”设想。

以上方法，又统一于“纯化”与“泛化”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笔者太老师、已故著名的哲学史家萧蓬父先生在1989年10月写成的《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与泛化》一文中指出：“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

① 余英时：《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② 余英时：《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③ 参拙著《黄宗羲伦理思想的主题及其展开》（在2008年5月答辩之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④ 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实现。哲学，可以广义地界定为‘人学’；文化，本质地说就是‘人化’。”因此，哲学研究，既要像以前那样强调“使哲学史纯化为哲学认识史”，又像当前那样“强调哲学史研究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他还说：“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其实，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或由博返约，或由约趋博，或纯化，或泛化，或微观，或宏观，或纵向，或横向，都可以‘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而只有经过这样的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中的反复加深，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思路、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① 萧先生主张的“从容涵化”“漫汗通观”学术史观，将是笔者终生谨记并勉力从之的。

^① 萧蓬父：《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与泛化》，载氏著《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重印版，第 417 页。